

名城史话

拉 萨

MINGCHENGSIHUA

主编：张明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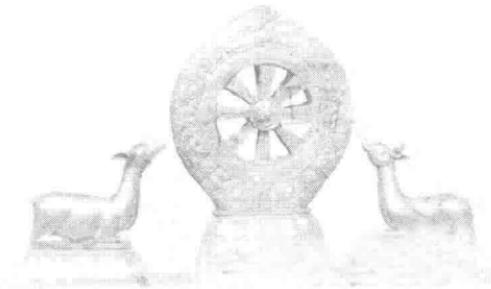


远方出版社

名城史话

拉 萨

MINGCHENGSIHUA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萨/张明林主编.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5
(名城史话)

ISBN 978 - 7 - 80723 - 222 - 3

I. 拉… II. 张… III. 城市史 - 拉萨市 IV. K29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2703 号

名城史话(拉萨)

主 编:张明林

责任编辑:胡丽娟

装帧设计:辉煌时代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 话:0471 - 4919981(发行部)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3400 千字

印 张:116.5

版 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套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80723 - 222 - 3

定 价:528.00 元(16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西藏是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	(1)
第一节 藏族源于西藏本土	(3)
第二节 吐蕃历史上第一位英雄人物：聂尺赞普	(14)
第三节 列国小邦时代文明的发展	(33)
小 结	(40)
第二章 拉萨从历史深处走来	(44)
第一节 吐蕃王朝都城拉萨的诞生	(44)
第二节 定都拉萨的经济基础与拉萨经济的发展	(55)
第三节 宫殿、寺庙建筑与拉萨河护城大堤的修筑	(61)
第四节 吐蕃王朝时期拉萨科学文化的发展	(70)
第五节 吐蕃王朝制度典章文化的建立和发展	(88)
小 结	(106)
第三章 西藏近四百年分裂时期的拉萨	(108)
第一节 分裂时期人们向往的圣地	(109)
第二节 拉萨地方寺庙的修建与各教派活动的发展	(110)
第四章 元代有效治理乌思藏与拉萨城市发展	(114)
第一节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对西藏的治理与八思巴 和桑哥的历史功绩	(114)
第二节 万户行政体制与元代拉萨	(117)
第三节 元代驿站设置与拉萨城市的发展	(121)

名城史话

小 结	(127)
第五章 明代拉萨的发展	(130)
第一节 明代拉萨面向整个西藏地区、面向祖国迈出了 历史的巨步	(130)
第二节 拉萨经济的发展	(133)
第三节 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	(144)
第四节 拉萨城市建设	(149)
第六章 清代拉萨城市的复兴	(156)
第一节 清代拉萨城市的规模与设施建设	(157)
第二节 清代拉萨城市经济、社会形态	(173)
第三节 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	(184)

第一章 西藏是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几十个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域，缔造了统一的国家。

中华民族文明是由几十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一个多元复合文化形态，呈现出千姿百态、万紫千红、气象万千、博大精深的特点，绵延 5000 年而永葆青春，并发展成为当代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奔腾潮流。

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历史造就的统一体；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一个多元复合文化形态，同样是历史所铸成。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几十个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自己民族所处的特定地域、特定历史条件出发，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因山就水，因地制宜，巧于创造，展示了巨大的智慧。同时，各兄弟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他们对祖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尽了自己的光荣职责，立下了与日月同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在中华文明史上，他们的业绩各占有光彩夺目的一页。

一般说，多民族与多元文化是密切联系的。但是，文明起源却要复杂得多，即使同一个民族的文明的起源也可以是多源

的；不同民族的文明起源又可以是同源的。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原来人们认为是单元的，即起源于中原的单元论。但是，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的单元论，已被我国几十年来的考古成就所打破。

我国考古学自上世纪 20 年代发迹，至今仅仅 70 多年的时间，考古工作已在全国普遍展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考古学已经成为一门大学问。王国维在上世纪 20 年代提出的考古遗存与文献“可参互求之”的方法，已成为我国考古学的一大特色。我国考古工作者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已经提供了打破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的单元论的足够材料。比如，我国考古发掘出土的先民遗存，已经确证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系统相对应的是三大部落。公元前约 3000 年期间，黄河、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发生了大的社会变革，形成了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龙山文化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社会产生和形成的开始，龙山文化群体，被认为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地，而龙山文化群体的分布是非常广大的。考古学家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基地，中原地区为中心，是多源的。

文明起源单元论已在我国破灭了。

自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 40 年间，我国广大科学工作者先后组织了大规模的多学科的青藏高原综合考察，其中包括对西藏广大地区的古人类文化遗址的普查；而后，西藏考古工作者与全国的考古工作者团结合作，有计划地重点进行考古发掘，对于揭示藏族族源和藏族先民创造的史前文化，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使藏族源于西藏大地的“本土说”得到了证实，藏族族源“外来说”破灭了。同时，沉睡地下数千年

的藏族先民创造的史前文化遗存重新回到人间，重现西藏古代文明的曙光。

从此，人们在以陈述的形式写出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历史时，在长江、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之外，又将以金光闪闪的大字写上西藏的尼洋河、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萨河流域！中华民族文明是多源的，西藏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第一节 藏族源于西藏本土

藏族族源神话与西藏高原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参互确证藏族源于西藏本土，“外来说”走到了破灭的尽头。

一、藏族族源神话

在西藏藏文书籍和广大民间流传着“猕猴变人”、“牦牛图腾”、“犬图腾”、“羊图腾”、“龙图腾”等神话传说。

1. “猕猴变人”族源神话传说

藏文典籍名著《贤者喜宴》中记述：“初有六只猴雏，继之繁衍众多，分为四部，并彼此发生争执，此即所谓西藏四人种……据传，菩萨（指父猴）携其子孙，并向他们示以不种自然之谷物，说：‘吃吧！’众猴遂于索塘贡布日塘嬉戏，故此地称为泽塘（泽当）。众猴因食谷物而变成人。他们食自然之谷物，穿树叶之衣，在森林中如同野兽一样生活……，而遍及于西藏”。《青史》、《西藏王统记》等书都记述藏族为菩萨化身的猴与岩罗刹结合而生。

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西藏一些寺庙的壁画中，也描绘着“猕猴变人”的传说故事。

名城史话

在西藏民间普遍流传着，在宇宙洪荒时代，雅鲁藏布江畔的泽当地方的贡波山岩洞里，猕猴与岩罗刹魔女相爱成亲，生下六个猴崽，尔后雏猴逐年增加，当地果实被吃净，大闹饥荒。父猴无奈，便带众小猕猴下树吃地上长出的不种自收的青稞、小麦、豌豆、荞麦。猴子吃了粮食以后，尾巴就慢慢地短了，也会说话了，渐渐变成了人，学会了游牧耕种，村落和城池也出现了。

藏族民间一向认为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农业谷地是“猕猴变人”的故乡。藏语把这块地方叫作“泽当”。传说在泽当地方及其附近区域，既有森林，又有良田沃土，其中有一块地就叫“吃地”。相传是猴子吃完山果之后，第一次改食谷物的田地。藏族农民认为这块“吃地”是西藏最早的耕地。藏族还把泽当孔布山猴子洞，视为藏族发祥地。

据藏族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考证：“猴”在藏语文里有小猿猴的含义。所谓岩罗刹，则是栖身于岩洞，靠食其他动物血肉的一种猿类。生活在雅鲁藏布江森林里吃野果的一种小猿类，与居住在岩洞里吃动物血肉的一种大猿类结合生育子女，逐渐进化成人类，不能完全说成是神话故事，而抹煞其科学性。他认为：这是藏族对世界人类起源和繁衍理论方面做出的最早一个伟大贡献。鉴于此，他提到达尔文著《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于藏历第十四绕回土羊年，即公元1859年，此后才出版赫胥黎著《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一书，并在赫胥黎的书之后，才出版了达尔文著《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恰白·次旦平措著《西藏简明通史》）。还有学者认为：对西藏“猕猴变人”（“猕猴”——是一种小猿猴的概念，为什么一定要指示是一种小猿猴呢？）传说，有可能反映出人类起源的重要

信息。

2.“牦牛图腾”、“犬图腾”、“羊图腾”、“龙图腾”型族源神话传说

“牦牛图腾”在西藏文献中有好多种记述，相传古代西藏曾被牛魔王统治；牦牛是“星辰”；野牦牛角里生出人，是智者，为英雄；野牦牛的头与角可降服四方妖魔；诸山神多化身为白牦牛；六牦牛部落古时居住在山南地区等（《贤者喜宴》、《王朝世系明鉴》、《格萨尔王传》、《敦煌吐蕃文献选》）。

民间流传“牦牛图腾”的地区，主要在西藏东北部果洛地区和四川、青海交界地带的果洛藏族中。相传，果洛地区的年保玉载匝日雪山是座神山。古代有位青年男子在神山附近从一只老鹰嘴里救下一条小白蛇，正是年保玉载匝日山神的幼子。山神便把三女儿许配给年轻人，而山神的女儿原是白牦牛，是白牦牛化身为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做了年轻人娇妻。后来，年轻人无意中打了山中的神牦牛，他妻子生气地跑到天宫去了。妻子留给他一个儿子，世代繁衍，成为后来的上中下三果洛。果洛氏族祖先与白牦牛婚配繁衍出整个果洛氏族的民间传说，在藏、川、青交界地带的果洛藏族中世代相传（果洛州文联编：《果洛藏族民间故事》）。

一些学者认为：西藏东北部民间传说中的雪山神、白牦牛山神、白牦牛山神女儿，白牦牛与果洛藏族祖先婚配传出氏族部落等，属于牦牛图腾型族源神话（谢继胜：《牦牛图腾型藏族族源神话探索》，载《西藏研究》1986年第3期）。

果洛部藏族过着典型的游牧生活，历史悠久，牦牛图腾崇拜源远流长。由于牦牛在西藏人民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牦牛形象在过去和现在的藏族群众心目中占有崇高的

地位。

诚然，把当代拉萨的牦牛雕塑在此写上一笔，只是为表明牦牛从古至今在西藏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透露着“牦牛图腾”神话在西藏形成与流传的自然与社会的客观基础，而丝毫无意把今日拉萨街头的牦牛雕塑与“牦牛图腾”混为一谈。因为“图腾崇拜”并非诸神崇拜，亦非动物崇拜，更非一种艺术形象的创造。只有人们把自己氏族的祖先认定为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无生物的东西）发展而来时，把该动物（或什么别的东西）崇拜为氏族的起源，氏族图腾的神话才产生出来。

“犬图腾”，《新唐书·吐蕃传笺注》：“犬为吐蕃图腾”。《新唐书·吐蕃传（上）》：“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与吐蕃将乞力徐进白犬盟，约定两国边将互不侵犯”。后背约，结果“俱见犬祟，疑而死”。《封氏闻见录》：“吐蕃讳狗，……今上（德宗）令改狗为苟”。《册府元龟》：“吐蕃，狗种，唐国与之为婚”。吕振羽著《中国民族简史》则明确认为藏族犬图腾族源神话的产生，是因为“西藏在太古时为大海，藏族祖先为居住在海底的一种神奇的海狗”。

藏族民间流传的“犬图腾”的传说，则比上述文献记述朴实多了。《青稞种子的来历》述说：王子阿初，聪明、善良、温厚、勤劳、勇敢。他看到人们缺乏粮食，便到蛇王那里去盗青稞。在山神帮助下，他化作狗形潜入蛇王宫殿。经过无数次的苦难，用狗尾粘着青稞种子逃回人间。蛇王发现了，便用咒语使他再难以恢复人形。幸得一女子的爱情，与他结为夫妻，他才得以恢复人形。他把青稞种子带回人间，被他妻子发现可以种植，青稞从此成为藏民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上海

文艺出版社《藏族民间故事》，1980年版）。这一民间传说中，人变狗形、狗变人形的描述。正是犬图腾的特质表现。

1991年5月，我们在拉萨市考察期间，所到之处，不论是寺庙前，还是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各式各样活泼健壮的狗群。在马路上，开着大车、小车的司机们都自觉注意不撞着狗。询问其中原因，藏族同胞异口同声地说：狗给人间带来的粮食，人们吃的是狗粮。西藏有谚语：“人吃狗粮，享的狗福。”因此，每年青稞收获之后，第一次磨出的糌粑先喂狗。这已成为藏族民间的风俗。

“犬图腾”文化现象并非西藏所独有，“犬图腾”遍及欧、亚、非、澳四大洲，反映了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男子外出狩猎，妇女在家照顾老人、孩子、供给食物、发明农作物种植，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现象。马克思认为：妇女是种植技术的发明者和把种植技术付诸实践的先驱，“在摄取经济中，经常关心以植物产品供给家庭的是妇女，因此妇女可以把种植这项伟大的发明付诸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研究藏族“犬图腾”的学者认为：“西藏先民一般选择诸如孔雀河、拉萨河、卡若河、尼洋河等有水源的谷地居住。当狗身上偶尔带来的谷粒在潮湿的地方长出，并周期性生长，这一现象被细心的妇女注意到了。于是，经过长期的摸索观察，终于掌握了栽培技术。因此，农业的发明是妇女的重大贡献”（林继富：《藏族犬图腾浅谈》，载《西藏研究》1988年第2期）。因为西藏藏族先民独立发明并创造了高原农业种植经验，这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羊图腾”，《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重鬼右巫，事羱羝为大神”。羱羝是一种西藏高原羊。《说文》释“羌”

字从羊。而羌人是藏族先民之一，“羊图腾”可能反映了羌人的图腾崇拜。因为唐代吐蕃王朝统治着青藏高原及其邻近的广大区域，所以《新唐书·吐蕃传》把羌人的图腾崇拜视作吐蕃的图腾崇拜。

“龙图腾”，《格萨尔王传》中有关于格萨尔王是天神与龙女结合所生的描述。在西藏又有关于吐蕃赞普仲年德娶的妻子来自龙族的说法。据说，龙族是当时西藏大地上一个显赫强大的氏族。这些故事表明，在藏族先民中可能有龙图腾氏族存在。

上述关于藏族族源的神话传说和图腾，其一，描绘了藏族起源于西藏大地；其二描绘了藏族先民独立地发明和创造了高原畜牧业（“牦牛图腾”、“羊图腾”）、农业（“犬图腾”），也透露了与中原民族关系的信息（“龙图腾”）。它体现的基本哲理是：环境创造人，人改造着环境。

在上述“猕猴变人”、“牦牛图腾”、“犬图腾”、“羊图腾”、“龙图腾”等族源神话传说中，“猕猴变人”的神话传说，历来被藏族民众视为自己最神圣、最基本的族源依据。西藏考古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已将“猕猴变人”传说产生的年代提早到距今3000至4000年之间。这一点将在下面具体写出来。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藏族先民似乎已经体察出西藏大地曾经存在过适于成为人类发祥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因而他们在经历一段漫长的认识客观外界事物的路程之后，在转而认识自身产生和形成的奥秘时，提出了闪烁着人类巨大智慧光芒的“猕猴变人”说。

西藏的大量历史文献，包括宗教史和各王统记，其中关于西藏远古时代自然地理气候变迁的描述，似乎都可以反映出

“猕猴变人”传说所具有的巨大智慧光芒的启示，比如：《贤者喜宴》中对西藏地区远古时代的变迁作了如下描述：“其时，上部阿里三围状如池沼，中部卫藏四茹形如沟渠，下部朵康三岗宛似田畴，这些均被淹没于大海之中。后因观音菩萨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众生祈祷，热海始而冷却、平静，并像注入桶一般，经贡布之拉曲消失；……随后，方使西藏地区的面貌清楚地显示出来。阿里三围为鹿、野驴兽区；中部四茹为虎、豺猛兽区；下部朵康六岗为飞禽鸣鸟区”（黄颢译：《贤者喜宴》一。载《西藏民院学报》1980年第12期）。《西藏王臣记》中描述道：“洪水消退后，上部阿里为雪山、石山；中部卫藏是岩山与草地；下部朵康是叶树与密林”（《西藏王臣记》北京藏文版，16页）。

把西藏古籍中关于西藏地区远古时代变迁的思考与“猕猴变人”的传说联系在一起，并非无稽之谈。任何一个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在没有现代科学考察手段的古代，都曾起过启发人类智慧的思想资料的作用，这种作用在科学技术发达的现代，仍然存在，何况古代乎！比如汉族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创造初民的神话；日本民族的滴水成屿，眼里生出祖先太阳神的神话；犹太民族的耶和华七日创造世界；亚当和夏娃夫妇是人类祖先的神话等。在全世界各民族探索世界、认识世界的众多煌煌巨著的思想宝库中，几乎都闪烁着上述神话的光辉启示！更何况“猕猴变人”神话传说的智慧内涵，即使在达尔文学说产生之前，也会启示人去思考“猴为什么会变成人”，以及“猴是怎样变人”的问题。凡是接触过儿童，晓得儿童经常提问“为什么”，就不会低估“猕猴变人”传说在西藏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如果“猕猴变人”

这个古老传说不是“外来的”，那么藏族源于“外来说”又怎么能够站得住脚呢？

二、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与考古

言之凿凿的族源资料，是科学考察和考古发现的。

1. 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

1973—1976年，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对青藏高原的全面考察，取得了巨大成就。

其一，依据综合科学考察资料判定：在距今1.6亿万年到1.4亿千万年的侏罗纪早期和中期，西藏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到了上新世初期，才上升为陆地。当时，西藏平均海拔2000米左右。地势东南低而西边稍高，西北部为针叶、阔叶混林地带；东南部为灌木丛、草地混杂地带，沼泽湖泊星罗棋布（中科院《西藏古生物》第一分册；《青藏高原的奥秘》，载《人民日报》1977年6月23日）。当时西马拉雅山未抬升，印度洋湿热季风可以畅通无阻地直吹到西藏地区，该地区气候湿热，为亚热带型；年均温度为10℃左右，年降雨量为2015千毫升。那时，热带植物遍布西藏，仅高等植物就达4000多种。1975年，在藏南吉隆盆地发现大量三趾马动物群化石（陈万勇、范贵忠、于浅黎：《西藏吉隆盆地上新世沉积相，粘土矿物质特征及古气候》，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5卷第4期；《青藏高原大规模多学科考察获得丰富资料》，载《人民日报》1975年12月6日）。1978年，在藏北申扎地区发现大量珊瑚、腕足、三叶虫等动植物化石，在藏北曲夏卡也发现大量古生物化石，其中有鬣狗、犀牛、兔、鹿等十多种动物化石。

到了第四世纪时期，喜马拉雅山不断隆起，逐渐形成隔绝印度洋湿热季风影响的屏障，西藏地区气候和自然环境发生巨变，形成干冷严寒的大陆性气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5卷第4期）。这种地理气候变迁严重威胁所有动植物的生存，在优胜劣汰规律支配下，一批古猿类被迫从树上走到地面觅食，栖身山洞等处以适应生存的需要，于是逐渐从猿进化为人类。

其二，1973—1976年，中国科学院的综合科学考察，便掌握了大量古人类活动的材料，在北纬 $28^{\circ}15' \sim 34^{\circ}47'$ ，东经 $82^{\circ}0' \sim 88^{\circ}41'$ 的广大地区分布着大量古人类文化遗址。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5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地点，找到细石器265件（《化石》1981年第2期）。

2. 西藏考古

对于西藏考古可以分两点来陈述：

其一，1956—1990年期间，西藏考古发现的古人类遗迹跨越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代，分布范围从海拔2700~5000米的藏北、藏南、藏西等西藏广大地区。

1956年，赵宗博先生在西藏黑河第一次发现古人类遗迹，及两件旧石器（《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第2卷）。

前面所述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发现25个新石器遗址和265件细石器，那是继赵宗博先生之后第二次在西藏广大地区发现古人类遗迹。

迄今为止，在西藏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地址有：定日的苏热、珠洛勒、名听；日吐的扎布等五处，海拔在4500~4800米之间；属于细石器时代的地址有：藏北的那曲、申扎、双湖、班戈；藏南的日喀则、聂拉木；藏西的日土，海拔在

4000~5000米之间；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地址有：昌都的卡若村、小恩达、烟多塘；林芝的云星、红光、居木、加括马；墨脱的背崩、马尼翁、墨脱村；拉萨的曲贡村等，海拔在2700~3900米之间。

其二，1978~1990年期间，重点在昌都卡若、林芝都普古、拉萨曲贡三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相当于内地龙山文化前后的大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1978年开始发掘昌都卡若遗址，它在昌都东南12公里，澜沧江南岸第二、第三台地上，海拔3100米，东靠澜沧江，南临卡若水，北依土丘山，西面是一片平地，遗址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先后两次发掘仅1000平方米。

该遗址共分五个地层：后期复盖层，第一文化层，第二文化层，第三文化层，原生土层，延续1000多年时间。“这是我国殷商以前距今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藏族先民居住的原始聚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7—1979年；文物出版社）。

卡若文化的年代，若与内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年代比较，排列可如下表：

名称	地 区	时 代	C14 测得年代(B.P)
仰韶文化	黄河中下游	新石器时代	5000±100
卡若文化	昌都澜沧江上游	同上	4370—4435
龙山文化	黄河中下游 辽宁半岛 江苏、安徽、湖北	同上	3965±95

资料来源：摘自江道原：《西藏卡若文化的居住建筑初探》。